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主体性与主体间性

刘富胜

【摘要】 中华民族走向现代经历了主体性迷失、适我性选择和为我性开创的过程，其主体性集中体现为“两个不走”与“四个不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是以国家安全为前提的现代物质文明和现代精神文明的有机统一。这种形态既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也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既深刻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的政治主体性和中华民族绵延不断的历史主体性，也充分彰显了和谐密切的党群主体间性、团结统一的民族主体间性和包容互鉴的人类主体间性。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主体性；主体间性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4769 (2025) 02 - 0001 - 07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同时强调“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①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主体性问题由此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焦点。有学者指出，文化主体性关系到国家形象的塑造和民族文化的身份认同^②；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提出，不仅蕴含着从传统到现代、普遍到特色的主体性自觉，而且蕴含对“现代化=西方化”这种形而上学迷失的内在超越。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主体性根植于历史、立足于实践，这种主体性既不认同，也不诉求以一种单一性去取代另一种单一性；而是承认和尊重“他者”主体的存在及其价值，主张不同主体都有延续传统和选择道路的平等权利，重视通过主体间的平等对话，生成团结应对各种挑战的整体力量。

一、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主体性自觉

主体性不仅意味着能动性、创造性，而且意味着“为我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③主体相对的概念是对象，主体能够认识和改造对象，对象是被动依附于主体的存在。从意识的角度来讲，人之外的动物不是关系性存在，甚至根本没有“关系”。^④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区分了三种生存状态，

【作者简介】 刘富胜，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重庆市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约研究员，重庆 40006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系化研究”（24AKS001）

①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② 田鹏颖：《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叙事逻辑》，《学术交流》2024年第2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3页。

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3页。

即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以及“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①其中，前两种状态都具有依附性：或者依附于人，或者依附于物。根据马克思对主体性的论述，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主体性自觉，是中华民族创造“属己的”“为我的”现代文化形态自觉，既坚定不移走出传统文化形态的窠臼，也旗帜鲜明拒绝对西方现代文化形态的依附。

走出传统文化形态的主体性迷失。尽管人们对“何为现代”有着各种各样的答案，但在资产阶级是现代文化形态的开创者上却有着普遍的共识。在生产上，资产阶级实现了从第一产业到第二、第三产业的转化，不以积累土地为目标，而以财富增值为目标；在生产关系上，资产阶级实现了雇佣工人的规模化和雇佣关系的普遍化，实现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劳动对象的分离，劳动者必须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取生存。资产阶级不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而且开拓了世界市场，推动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②西方列强凭借资本、技术和军事优势，向其他民族进行扩张，并把资产阶级为主的西方文化强加给其他民族。强者定义了自身的文明、进步与开化，也定义弱者的野蛮、落后与未开化，弱者在强者的一再蹂躏中迷失了自我，并开始了对强者的迷恋，这就是弱者的主体性迷失。鸦片战争让中华民族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天朝上邦的自负和虚荣，被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必须要在世界格局中进行重新定位。传统文化既然没有能够成为拯救民族于危亡的力量，就必然会在人们的反思中成为民族一再落败的渊藪。“打倒孔家店”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厌恶和对现代文化的渴望。中华民族与传统文化相生相成，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积淀而成的文化，没有传统文化，何以标识中华民族？同时，传统不是静态的封闭概念，而是动态的历史生成，曾经并非中华民族传统的佛教文化，早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西方列强的暴力扩张和中华民族遭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问题不在于中华民族是否需要走向现代、选择现代文化，而是在于如何走向现代、选择何种现代文化。

选择“适我的”现代文化形态。如果把西方列强之所以强和中华之所以弱，归结为西方列强拥有先进的现代文化形态，那就需要追问什么是现代文化形态，现代文化形态是一种还是多种？认为现代文化形态的核心是科技，自然就会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着力“重道轻术”的传统，补足“术”的短板；认为现代文化形态的核心是产业，自然就会提出“中体西用”，着力“重农轻商”的传统，积极发展现代工商业；认为现代文化形态的核心是制度，自然就会提出“维新变法”或者“社会革命”，着力“天不变道亦不变”传统，要么倡导君主立宪，要么选择民主共和。在各种尝试都失败之后，人们发现，学习西方的虔诚并没有改变被西方暴虐的命运，“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③西方列强一方面“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另一方面则是要“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④西方与东方，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双向对话，而是西方作为单向主体对东方的侵略与掠夺，将东方作为殖民和压榨的对象。十月革命让中国人看到了走向现代文化形态的另一种可能：同属于东方的帝国主义薄弱链条，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走向了社会主义，并在保持民族独立性的同时快速实现了现代化。实践证明，资产阶级尽管开创了现代化，但没有终结现代化；资产阶级同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一样，在阶段性发挥积极作用后，终将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绊脚石。十月革命选择了一条不同西方的道路，但却是一种代表真理、拥有远大前途的道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自觉担负起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始终围绕一个主题，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⑤

开创“为我的”现代文化形态。理论上的适合并不意味着实践上可以照搬照抄，历史不同、文化不同、国情不同，决定了任何民族走向现代的道路并不完全相同，资本主义如此，社会主义也如此。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6页。

⑤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4页。

俄国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就在于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时代化，创造性提出了“帝国主义论”“一国革命论”等主张。中国革命要成功，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需要借鉴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但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不能把俄国经验神圣化。毛泽东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是“矢”与“的”的关系，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学习理论的目的是为了用，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这个“矢”，去“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①“矢”与“的”的关系，明确了中国革命的主体性，中国革命没有其他任何目的，就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中国革命如此，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如此，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②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现代化，都始终坚持了“为我性”原则。我们坚持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时也根据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我们开创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为我性”集中体现在“两个不走”和“四个不是”。所谓“两个不走”，就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更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所谓“四个不是”，就是“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③

二、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主体性建构

主体具有社会历史属性，既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也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指出：“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④把主体作为认识主体、反思主体，是启蒙运动以来一种理性建构。福柯认为主体是“完全新近的造物”，其历史“还不足200年”。^⑤把主体作为历史主体、实践主体，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鲜明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的政治主体性和中华民族绵延不断的历史主体性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种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主体性建构，必然以国家安全为前提，实践证明，没有国家的主体性就没有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必然以现代物质文明为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⑥，没有强大的现代物质文明，就不可能有影响深远的文化形态；必然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然坚守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维护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是民族文明和文化主体性的前提，没有强大的国家支撑，必定不会有兴盛的民族文明，也就没有了文化主体性。黑格尔认为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⑦和“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⑧马克思反对神化国家，指出黑格尔颠倒了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国家不是市民社会的完成，而是市民社会的体现；不是真正的共同体，而是虚幻的共同体。马克思也反对无政府主义，认为国家不是罪恶之源，要对国家进行区分，无产阶级要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⑨中华民族拥有悠久历史，为人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3页。

③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7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8页。

⑤ 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16年，第312页。

⑥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9页。

⑦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17页。

⑧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第321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03页。

类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文明不仅影响周边国家，而且远播于中亚和欧洲，莱布尼茨、拿破仑等都对中华文明有过论述；马可·波罗、利玛窦、汤若望等都先后来到中国。鸦片战争后，国土被蚕食，主权被侵犯，生灵涂炭、文明蒙尘。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三座大山”，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主体性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的完成，我国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成功研发了“两弹一星”，恢复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彻底结束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有力捍卫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主体性提供了坚强后盾。改革开放以来，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干涉与渗透，我们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将其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①，经受住了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严峻考验，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并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主体性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安全，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极大增强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主体性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

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的主体性。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没有物质文明上的自主，就很难有精神文明上的独立。马克思指出：“那些和创造物质财富没有直接关系的生产领域实际上也日益依附于资本”。^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很快意识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提出了“第二个革命”，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只有进行第二个革命，即“产业革命或者说经济革命”^③，才能彻底实现民族的自主。在《论十大关系》《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注》等著作中，毛泽东强调不能机械照搬他国经验，认为要从本国实际出发，批判学习他国经验，既要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也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④邓小平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⑤社会主义之所以比资本主义优越，就在于能够更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每个民族走向社会主义的基础不同，社会主义发展的程度有差异，但经济长期停滞和人民生活长期处于很低水平总不能叫作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看生产力是否发展”。^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战略自信和保持战略定力”^⑦，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坚守好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主体性，不是纯粹形式的抽象主体性，而是具有丰富内涵的具体主体性。主体性不仅意味着独立自主和为我所用，而且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和目标方向，即既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魂脉”。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就无法走出西方现代文化形态的泥潭，就无法获得真正的主体性。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形态“根植于农耕文明”^⑧，在本质上不是现代文化形态，不能简单用传统文化形态来指导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建设。马克思主义既是现代文化的产物，又是对西方现代文化形态的扬弃。马克思从不否认工业和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指出工业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239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6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4页。

⑦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76页。

⑧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第92页。

人的本质力量的书”^①，技术进步能够“造福于整个社会体”。^②马克思认为，任何离开工业和技术追求人类解放的企图都是空想，人类解放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否则在因物质贫乏而争取生存的斗争中，“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③工业和技术是任何现代文化形态的基础，但工业和技术不是现代文化形态的全部，在不同制度下，工业和技术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不同的意义。“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④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伟大成就的过程，就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态的现代转型、进而创造出中华民族现代文化形态的过程。守好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同时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使之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和实践特色。

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表明，我国拥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民族既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传统文明，其所蕴含的文化基因，也必然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体现在哲学、宗教、文学之中，也体现在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中。文化作为社会意识，一方面由社会存在所决定，另一方面具有相对独立性，“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具有历史性、地域性，是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与边疆地区的游牧文化、渔业文化不断融合的产物；也具有普遍性、人类性，反映了人类社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独特思考，其中的很多要素对现代社会依然具有重要启示。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例，生态问题集中爆发在工业革命之后，但并不意味着生活在传统社会中的人们对此没有见地。老子的“道法自然”，用现代系统论来阐释，就是要把人的行为放到更大系统中进行思考，不能超过系统可以承受的阈值；孟子的“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用生态经济学来阐释，就是“减少对环境资源的需求，但增加对道德资源的需求”。^⑥如果说西方现代文化加剧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为破解现代化难题提供了独特视角，成为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⑦守好“根脉”，一方面要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保护，另一方面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与人民群众的日用平常结合起来，不断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使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持续贡献力量。

三、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主体间性彰显

主体性的“为我性”容易转变为“唯我性”，即不承认我之外的其他主体，并认为“可以毫无顾忌地吞没它们”。^⑧马克思认为，主体不仅因认识和改造对象成为主体，也因为彼此间的相互承认成为主体，“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当做人，只是由于他把名叫保罗的人看做是和自己相同的”。^⑨主体不是独在，而是关系性共在，任何主体都没有资格垄断共在空间；与此同时，任何主体都有义务为解决共在空间的问题贡献智慧。主体间性反对独白式论证，强调互动中生成，哈贝马斯指出：“共识的基础是主体间对于有效性要求的认可。这些有效性要求反过来又是由交往参与者相互提出来的，并可以加以彻底的批判和检验”。^⑩从内部关系来看，中国共产党在党群互动和民族交融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塑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9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80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9页。

⑥戴利等编：《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马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44页。

⑦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315页。

⑧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21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页。

⑩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5页。

造着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构成了层次清晰、内涵丰富的主体间性；从外部关系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既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有现代文化形态的共同特征，在交流互鉴中彰显了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共同探索人类文明新路的主体间性。

和谐密切的党群主体间性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坚强保证。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无数仁人志士和政党都曾为之努力却终遭失败，中华民族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①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并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革命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和改革也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②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全国人民把他们对于前途的一切希望寄托在党的领导下”“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的保证还是党的领导”。^④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就在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在于“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⑤；就在于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良性互动，既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也积极向人民群众学习，甘拜人民为师。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主体间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密切联系群众。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把脱离群众视为最大的危险，重视调查研究，主动倾听人民群众的声音，做到“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⑥二是坚持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无论是革命时期的“三三制”原则，建国初期的政治协商，还是最终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都是要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⑦三是坚持党的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自己的错误”^⑧，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做到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团结统一的民族主体间性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重要基石。“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的显著特征，“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各民族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⑨，并在与西方列强及其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激活，由此形成自觉的民族实体与整体认同。梁启超在1902年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认为中华民族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⑩孙中山认为走向现代需要有统一的民族观，各民族要“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⑪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同时包括蒙、回、藏、维吉尔、苗、彝、壮等在内的统一民族，中华民族拥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成立之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增强，一方面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将民族平等写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另一方面强调民族团结，创造条件积极推进各民族共同繁荣。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4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350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0页。

④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502页。

⑤ 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23年，第173页。

⑥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65页。

⑦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第530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0页。

⑨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⑩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6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419页。

⑪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7页。

⑫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2—623页。

改革开放后，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工作步入了法制化、规范化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脱贫路上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也不能少，“没有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就难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①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需要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团结统一的民族主体间性体现在经济上就是各民族相互帮助、优势互补，共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现在政治上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着在一起”，共同维护整体利益和国家安全；体现在文化上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既做好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又坚定不移地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包容互鉴的中外主体间性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活力源泉。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走出了适合本国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另一方面为既想独立又想发展的国家探索了新路，为破解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在此意义上“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②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是在与其他民族相互交往中生成的新型文明。《共产党宣言》指出，在资产阶级开辟了世界市场之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传统社会中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③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具有开放包容的基因，佛教和伊斯兰教作为外来宗教，都能够在中国发扬光大，并深深浸润在传统文化之中。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同时，“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④，既要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也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扭住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内部要继续改革，对外要进一步开放，“一个国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独立，必须努力摆脱贫困”“不要给自己设置障碍，不要孤立于世界之外”。^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一方面，我们坚定“四个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⑥；另一方面，保持开放态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各种文化形态相互学习与借鉴，才能“为人类文明发展注入动力”。^⑦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始终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发，不把自己的安全和发展凌驾于其他民族和国家之上，认为在相对封闭的地球空间中，世界各民族需要携手应对粮食、环境、传染性疾病、核战争等风险；积极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认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是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但这些理念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不能把西方价值普世化，更不能将其作为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

总的来讲，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独立自主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是民族性与人类性的有机统一，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之魂和中华传统文化之根确证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又在承认和尊重人类现代文化形态的多样性，并在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充分彰显其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主体间性。

（责任编辑：颜 冲）

①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第508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1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1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2页。

⑥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14页。

⑦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460页。